

明神宗與《詩經》講習

連文萍*

(收稿日期: 99 年 12 月 31 日; 接受刊登日期: 100 年 4 月 27 日)

提 要

《詩經》是《五經》之一，也是各體詩歌的源頭，在經學及文學上均有深遠的意義與影響。本論文以明神宗朱翊鈞的《詩經》講習狀況作為論述重點，兼及其他皇族成員的學習經驗，也探討明神宗的輔臣們，對於《詩經》的不同講習觀點，宗藩《詩經》講習的成效，《詩經》對明代皇族詩歌創作上的意義。祈能透過明神宗的《詩經》講習，了解明代皇族傳承《詩經》的部分面向，也觀察《詩經》講習對於明神宗及其他皇族從事詩歌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詩經、詩歌、明神宗、皇族、教育、明代

* 連文萍，臺灣新竹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國文天地》雜誌副總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通訊》週報記者、淡江大學及世新大學等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明代茶陵派詩論研究》、《明代詩話考述》及論文多篇。

E-mail: ping@scu.edu.tw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98-2410-H-031-053-MY2）的部分研究成果，並承蒙林慶彰教授及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僅此致謝。

一、前言

明代教育以儒家學說為主軸，皇族的教育內容，¹亦以《四書》、《五經》為主，但其講習目的不同於一般士人，皇帝或皇太子研讀經書，除了涵養君德，尤在學習治國之道；親王及就藩各地的宗藩子弟，以修德正心，端正自我言行爲務，要求「先行後文」。²他們都不必如士人爲因應科舉，在章句、文辭上嚴格訓練、刻意用心，如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皇長孫朱瞻基（1435-1399）出閣就學時曉諭輔臣，即謂：「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究，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爲能也。」³皇族接受講習的方式、師生關係，也由於地位特殊而別有不同，特別是皇帝經筵、日講，⁴因爲皇權至上，輔臣及講官多畏懼臣服，講習內容及方式須經請示，皇帝亦可質疑、評鑑講官，不合意者甚至予以貶斥。⁵

《詩經》是明代皇族教育的重點之一，同時也是各體詩歌的源頭及寫作的典範，具有經學與文學上的深遠意義與影響。本論文以幼年即位、學習紀錄較完整的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作爲觀察重點，論述其《詩經》講習的實況及延伸的相關問題，兼及其他皇族的學習經驗，祈能了解明代皇族傳承《詩經》的部分面向，也觀察《詩經》講習對明神宗及其他皇族從事詩歌創作的影響。

¹ 「明代皇族」主要指皇帝、皇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及分封各地的宗藩，包括藩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等，還有被廢的庶人。本論文限於資料及篇幅，討論主題集中在明神宗的《詩經》講習，兼及男性的皇族子弟，女性皇族的教育問題暫不討論。

²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5年。下文所引明代實錄，俱爲同期影印本，不另註明。），卷50，（萬曆四年五月壬寅），頁1150，河南撫按孟重等條上宗學事宜十二事：「其各生講解經書、《性鑒》外，仍授以《皇明祖訓》、《孝順事實》諸書，使知先行後文之意。」

³ 見《明太宗實錄》，卷66，（永樂五年夏四月辛卯），頁0926。

⁴ 經筵與日講都是針對皇帝進行的教育制度。經筵在明初時無定制，亦無定所，據〔明〕李東陽等撰，〔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卷52，〈禮部十·經筵〉，頁917：「正統初始著爲儀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月三次，寒暑暫免。」換言之，經筵即爲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儒臣會講於文華殿。日講即每日講讀，是在經筵之外的時日進行，《大明會典》，卷52，〈禮部十·經筵〉，頁917，謂：「日講於文華穿殿，其儀簡」。

⁵ 如明世宗朱厚熹（1507-1567）不賞識講官魏校（1483-1543）的《尚書》講讀而加以貶斥，相關始末，陳恆嵩：〈魏校及其《尚書》經筵講義析論〉（揚州：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2010年6月16-18日）有所論述，可參。

二、明神宗的《詩經》講習進程

明代立國即側重儒學教育，皇族皆是《五經》俱習。其中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因為攸關國家的治亂興亡，所以特別注重，有一定的講習制度。皇帝經筵一般皆以《大學》、《尚書》起步，如天順八年（1464）八月，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初開經筵，由大學士李賢（1408-1466）講《大學》經之一章，陳文（1405-1468）講《尚書·堯典》首章，⁶故黃佐《翰林記》謂：「當今儒臣進講，《四書》以《大學》為先，《五經》以《尚書》為先，今經筵因之。」⁷日講亦是如此，張居正（1525-1582）為明神宗制定的日講課程，即由講讀《大學》、《尚書》開始。⁸

明代親王的講習內容也首重《四書》、《五經》，尚未就藩的親王，可能與皇太子一起學習。⁹親王分封就藩後，許多宗藩樂於學，重視子弟教育，要求自幼研讀經書，日後能知書好禮，如唐藩朱彌鉞（1490-1542）「生負奇質，甫七歲，王考命教授授書，能成誦。」¹⁰而唐藩子孫如康穆王朱芝垓等，也能以「博通群經」著稱。¹¹

《詩經》在帝王教育中的講讀次序，並沒有如《大學》、《尚書》被強調及記載，所以必須考察皇帝的生活細節，方能勾勒具體「課表」。明代皇帝的幼年求學紀錄中，明神宗因沖齡即位，又有嚴格的輔臣從旁督促，可資詳考。《明神宗實錄》記錄萬曆十年（1582）正月丁亥，大學士張居正等上疏：

二月十二日經筵開講，除《孟子》照常進講外，其《書經》去年講完，今歲應講《詩經》。此書本人情，該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

⁶ 見《明憲宗實錄》，卷8，（天順八年八月癸未），頁0177。

⁷ 〔明〕黃佐：〈講讀合用書籍〉，《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1966年），卷9，頁122。

⁸ 〔明〕張居正：〈擬日講儀注疏〉，《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346冊，影印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2002年），卷37，頁314。

⁹ 如〔清〕張廷玉等：〈興宗孝康皇帝傳〉，《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15，頁942，記錄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¹⁰ 〔明〕張璧：〈承休昭毅王墓表〉，《陽峰家藏集》（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明嘉靖二十四年世恩堂刻本，1997年），卷33，頁618。

¹¹ 〔明〕朱謀瑋：〈唐藩〉，《藩獻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明萬曆刻本，1994年），卷3，頁766、767。

國平天下，於君德治道，裨益不淺。¹²

可知，明神宗的《尚書》經筵講習，在萬曆九年（1581）已講習完畢，接著要進講《詩經》。張居正提議後，明神宗的《詩經》經筵講習狀況，並無明確的紀錄，但《明神宗實錄》在萬曆十年二月辛丑、辛亥；三月庚申、庚辰；四月己亥等，都有「上御經筵」的記載，¹³可見明神宗均循往例御經筵接受講習。

張居正及講官為經筵進講所需，編有講章《詩經直解》。¹⁴此部《詩經直解》內容完備，應有實際進講，但可能沒有講完。因為萬曆十年六月丙午，張居正就因病離世，不久，更被削爵抄家，¹⁵所以此部講章也未照例發下司禮監鏤板刊行，顯然是受到牽連。

講章的編撰及刊行，是帝王教育的重要環節，輔臣及講官在開講前預撰講章，講完後，要重複校閱及修改，再進呈御覽，以備溫故知新，並要發下司禮監刊板印行，以傳久遠。這種處理程序已成定制，張居正〈進講章疏〉即謂：

臣等一歲之間，日侍皇上講讀，伏見聖修益懋、聖志益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能知新，況今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僅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即行刪除，編成《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伏望皇上萬幾有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於聖功，實為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御覽，仍乞勅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淺近之

¹² 《明神宗實錄》，卷 120，（萬曆十年正月丁亥），頁 2250。

¹³ 二月「辛丑，上御經筵」見《明神宗實錄》，卷 121，頁 2260；「辛亥，上御經筵」見同卷，頁 2264。三月「庚申，上御經筵」見卷 122，頁 2271；「庚辰，上御經筵」見同卷，頁 2284。四月「己亥，上御經筵」見卷 123，頁 2293。五月「己未，上御經筵」見卷 124，頁 2306。此外，明神宗上文華殿講讀的「日講」記錄更多。可見到六月丙午張居正病卒的前後，明神宗的經筵、日講均如常進行。

¹⁴ 《詩經直解》有萬曆四十年（1612）張居正之子張懋修蒐集刊行之本，書名為《新鐫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現已由上海：學林出版社於 2009 年重新排版發行，書名改作《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

¹⁵ 關於張居正身後被削爵抄家，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深圳：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有詳述，可參。

言，不足以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¹⁶

是故，講章雖為帝王啓蒙之用，內容雖為章句之說解，但講讀完畢並未廢棄。張居正先前已經進完的《書經直解》，即在校閱及修改完畢後，付諸司禮監刊刻。¹⁷

明神宗的《詩經》講習，在萬曆十一年（1583）仍持續著。二月一日，新的教習年度開始，輔臣大學士張四維（1526-1585）等上疏云：

二月十二日經筵開講，去年秋講《四書》、《書經》講完，今見講《詩經》，仍該用一經進講。《周易》一書，先王明天道以修人紀，其理雖奧衍宏深，至于擬議言行，會通典禮，關於君德治道，最為詳切。故自祖宗列聖以來，凡幸太學，必令儒臣以是書敷講，厥有深意。合無今次以《周易》同《詩經》進講，用為聖學緝熙之助。上然之。¹⁸

《詩經》在萬曆十一年為經筵講讀的主要內容之一，惟當時所編的講章，並無留存與紀錄。然而明神宗少了張居正的嚴格督促，接任的輔臣又軟弱怕事，故此後經筵、日講俱日易曠廢，如萬曆十四年（1580）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學士申時行（1535-1614）上疏即謂：「今通查一年之內，日講不過數次，講章甚少，不能成帙」，¹⁹最後終於完全停止。萬曆十六年（1582），申時行上疏建議改以預撰講章、先行進呈的方式，由明神宗先行閱讀學習，並祈請神宗能親臨講筵：

臣等擬令講讀諸臣將逐日講章照常撰寫，雖遇免講，仍進講章，皇上特賜覽觀，就便溫習，俟金秋涼爽，玉體康寧，特御講筵，接續進講，庶聖學無暴寒之間，而諸臣亦得效其啟沃之忠，伏乞聖明裁允，令臣等遵奉施行。²⁰

此舉改變了明神宗的講習方式，經筵及日講的形式雖在，然由講官預撰講章進

¹⁶ 見《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38，頁329。此疏亦見《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明末抄本及民國抄本，1988年），第1冊，（萬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乙丑），頁138-139，可知講章的校閱、修改、刊刻，在萬曆元年已確立，其後成為定制。

¹⁷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96，〈志七十二·藝文一·經類·書類〉，頁634、635，著錄張居正《書經直解》八卷。

¹⁸ 《明神宗實錄》，卷133，（萬曆十一年二月甲申），頁2469。

¹⁹ 見《萬曆起居注》，第2冊，（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癸未），頁757。

²⁰ 《萬曆起居注》，第3冊，（萬曆十六年六月二日癸未），頁68-69。

呈，讓皇帝自行閱讀，君臣之間已無實際的講讀互動。

《詩經》日講講章的進呈，據《萬曆起居注》所載，萬曆二十一年（1593）五月十四日，大學士王錫爵（1534-1610）題請進日講講章事宜，希望在《禮記》之外，進講《詩經》及《孝經》：

先該臣等欽奉聖諭，令講官將《禮記》逐日進講，令已進過講章將及〈儒行〉終篇，臣等看得〈儒行〉而後，有冠、婚等項，六義皆儀文器數之類，於理道不甚緊關，講臣無可敷衍議論、陳獻忠蓋者。臣等又看得經書之中有《詩經》、《孝經》二書，皆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為德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翼諸經、日新聖學。伏望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令其接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進呈，以候皇上親臨聽講。²¹

此份奏疏日後刊入《王文肅公奏草》，²²可見是王錫爵為官經歷中的重要文件。然當時是否獲得明神宗的裁示，並沒有進一步的記錄。萬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日，大學士趙志皋（1524-1601）等，應明神宗要求，預撰講章進呈時，特將近年所撰講章作一考查，有謂：

謹查得見今講書三項：《易經》于萬曆十九年三月內進講章，自《周易》上經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繫辭〉〈序卦傳〉止，六本將完。《詩經》于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內進講章，自〈國風〉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小雅·瓠葉〉章止，計四本半未完。《通鑑纂要》于萬曆十七年七月內進講章，自太昊帝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東漢光武建武八年止，計十本半未完。除《詩經》、《通鑑纂要》二項，所餘本數，陸續進講外，其《易經》待開春講完，臣另擬當講書籍，恭候聖明裁定遵行。²³

可知明神宗確實接受王錫爵的建議，並選讀了《詩經》。因此，《詩經》於萬曆

²¹ 《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丁卯），頁339-340。

²² 見《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奏草》（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王時敏刻本，1997年），卷11，頁231。

²³ 《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癸丑），頁870-871。

二十一年五月開始進〈國風〉講章，到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進至〈小雅·瓠葉〉，合計進講章四本半，且後續將把《詩經》進完。

輔臣進呈明神宗御覽的講章，仍照張居正講習時的往例，每年年終發下司禮監刊板，以備皇帝溫習觀覽。所以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學士趙志皋等上疏謂：

今查萬曆二十一年至今所撰講章：《易經》豫卦至離卦一本，咸卦至益卦一本；《詩經》〈國風·周南·關雎〉至〈豳風·狼跋〉一本，〈小雅·鹿鳴〉至〈我行其野〉一本；《禮記·祭統》一本，〈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本，〈坊記〉〈表記〉一本，〈緇衣〉〈儒行〉一本；《通鑑纂要》秦二世至沛公入武關一本，沛公至霸上至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一本，孝文帝元年至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一本，類寫裝潢進呈，伏望皇上萬幾之暇，時加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²⁴

因此，萬曆二十一、二十二年，輔臣所進講章包括《易經》、《詩經》、《禮記》、《通鑑纂要》。²⁵至於《詩經》講章何時進完？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一日，大學士趙志皋等上疏：「看得《詩經》講章見今將及進完」，²⁶到萬曆三十年（1602）閏二月十九日，大學士沈一貫（1531-1615）為日講事所上奏章，有謂：

伏觀皇上自臨御以來，典學時敏，《學》、《庸》、《語》、《孟》之外，《五經》則《易》、《書》、《詩》、《禮》俱已講過。²⁷

可見到萬曆二十五年二月，《詩經》講章即將進完；到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則《詩

²⁴ 《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丙寅），頁882-883。

²⁵ 按，《易經》、《詩經》、《通鑑纂要》三書講章的進呈，俱見前引《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癸丑），頁870-871，趙志皋的題疏。《禮記》一書的講章進呈，則見前引《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丁卯），頁339-340，王錫爵的題疏。故萬曆二十一、二十二年進呈的講章包括《禮記》、《易經》、《詩經》、《通鑑纂要》。

²⁶ 《萬曆起居注》，第5冊，（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壬戌），頁499。趙志皋等在此日題請，將祖宗實錄中足以垂法後世者，每日摘取一條，預撰講章，待《詩經》講完，接續進呈。

²⁷ 見《萬曆起居注》，第7冊，（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十九日壬子），頁376-377。

經》講章已進呈完畢。明神宗所閱讀的《詩經》講章，趙志皋疏文說已發司禮監刊板，但今日未見留存。

三、張居正與王錫爵進講《詩經》的觀點

觀察明神宗的講習紀錄，萬曆十、十一年間，在張居正、張四維等輔臣的引導下，《詩經》接續《大學》、《尚書》之後，作為經筵講讀的內容之一。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則在王錫爵等的題請下，接續《禮記》之後，以預撰日講講章的方式，開始進呈〈國風〉的講章。這是明神宗接受《詩經》講習的兩段主要時間，倡議者分別是張居正與王錫爵，他們都上疏說明進講《詩經》的理由，同時也揭示他們對《詩經》的講習觀點。

張居正幼穎悟，五歲入學，十歲通《六經》大義，對於程朱一脈儒學傳統，自是熟稔貫通。前引他在萬曆十年（1582）正月丁亥的上疏，即謂《詩經》「此書本人情，該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於君德治道，裨益不淺」，可知在張居正的講習觀念中，《詩經》具有由內而外、內聖外王的教學意義和效果。其說實即朱熹（1130-1200）於〈詩集傳序〉所言：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²⁸

所以張居正主張以《詩經》接續《尚書》之後的進講，正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可由《詩經》得之。

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熟稔經書制義，所作程試之文，傳誦天下。²⁹他在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上疏題請進日講講章事宜，希望在《禮記》之外，進講《詩經》及《孝經》，有謂：

²⁸ 〔宋〕朱熹：〈詩集傳·序〉，見朱傑人等校點：《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51。

²⁹ 見〔明〕馮時可：〈王文肅公傳〉，《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哀榮錄》，卷14，頁481。

《詩經》、《孝經》二書，皆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為德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翼諸經、日新聖學。伏望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令其接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進呈，以候皇上親臨聽講。³⁰

這份疏文值得注意。其一，王錫爵也像申時行一般，在疏文中祈請明神宗能親臨聽講，使講讀成效更顯著。其所謂「預撰講章進呈，以候皇上親臨聽講」的祈請，已成為此後輔臣上奏的固定陳述用語，軟弱無力也沒有作用，進呈講章終究取代經筵、日講，成為明神宗主要的講習方式。而其「隨意擇講一書」的說法，也可具體看出，皇權高漲下的講習模式與師生關係俱十分獨特，皇帝雖是「受教者」，但擁有核可講習內容及方式的權力，輔臣和講官畏懼臣服，只能從旁建議，並消極的等候皇帝的親臨聽講。

其二，前述張居正認為《詩經》「本人情，該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所以主張接續《尚書》之後進講。王錫爵則認為《詩經》是經過孔子刪定，讀《詩經》可得性情之正，可以博而有要，作為諸經的羽翼、日新聖學，因而建議繼《禮記》之後接續進講。由此可窺出，同一部《詩經》，在不同輔臣的講習觀念中，其先後次第及教讀目的有所不同。

其三，王錫爵將《詩經》與《孝經》並置而論，請明神宗擇一進講。說明了在他的觀念中，《詩經》雖屬《五經》之一，但就帝王學而言，其地位與不屬《五經》之列的《孝經》相當，是居於從屬、輔翼諸經的位置，所以可以「隨意擇講一書」。推究其中原因，與其所謂《詩經》得性情之正、《孝經》是德教之先有關，在王錫爵看來，《詩經》、《孝經》的講習重點，在於情志的發抒移易與道德品行的陶冶，主要是內修的功夫，而未強調治國之道。

其四，王錫爵所謂《詩經》「得性情之正」，可能不只是在遣詞用字上，與《孝經》「為德教所先」相對，而是其對《詩經》價值的詮釋。相較於張居正視講讀《詩經》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錫爵之說的面向較為單一。其說與王守仁（1472-1528）力倡心學，認為《六經》與人心相通可能存有關係。王陽明之說對其後士人解讀《詩經》產生深遠影響，有固守朱熹《詩集傳》之說者，有專務漢學、考據路線者，也有諸多從性情、藝術角度臆說者。³¹王錫爵是

³⁰ 見《萬曆起居注》，第4冊，（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丁卯），頁339-340。

³¹ 王守仁之說對明代《詩經》學的影響，劉毓慶：〈陽明心學與明代《詩經》研究〉，《齊

否受到學術風氣移轉變動的影響，而對《詩經》的接受偏重於性情的角度，值得推敲。考察王錫爵的《王文肅公全集》，並無有關《詩經》的專述，但其〈唐詩會選序〉，在論述詩歌起源於《詩經》時，有謂：

詩之為教，非小技也；其感人，非小用也。夫古昔《三百篇》，不過里巷歌謠之語，與夫大夫君子舒洩其胸中之天紹，并禋祀、朝會、燕享之樂章耳。然夫子選之，至與義、文、周公之《易》，堯、舜、禹相授受之《書》，垂教萬世，且諄諄為訓曰：「何莫學夫詩」，何哉灼見。其發之性情，止于禮義，悲而不傷，憂而不怨，溫厚和平之旨，溢于言表。其于養性淑身，誠哉有賴也。³²

序文中，王錫爵認為《詩經》不過里巷歌謠、禋祀、朝會、燕享之作，然經孔子選定，與《易經》、《尚書》俱垂教後世，可以養性淑身。此與他在疏文中所言相類，顯見是其對《詩經》的一貫觀點，特別是「養性淑身」，正是所謂「得性情之正」，是其認為明神宗研習《詩經》所能達到的功能與目的。是故，王錫爵所陳述的《詩經》講習觀點，除反映其屈奉順從的教學風格，也令人聯想心學的盛行，可能讓明神宗《詩經》日講的內容及目的有所變化。³³

四、明神宗的《詩經》講習內容

由前述明神宗的《詩經》講習紀錄可知，《詩經》的講授順序為〈國風〉、〈小雅〉、〈大雅〉，其實際講讀的內容，則可透過張居正等所編撰之《詩經直解》考察。此書今日已重新出版，書名題作《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³⁴

魯學刊》2000年第5期，頁52-57有論述，可參。

³² 見《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文草》，卷1，頁197。

³³ 王錫爵文集中並無《詩經》專述，因此其與心學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考察。其另篇〈題大學解〉（《王文肅公全集·王文肅公文草》，卷3，頁264-265），或可體察其論學之旨：「蓋昔者夫子始刪《六經》，而文多闕疑，不敢自用。乃今《大學》盛行，自好事者表章賈、鄭二古文，而今文幾廢。愚聞嘗竊取西河切問近思之義，研泳其間，則見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而他文出秦火斷爛之餘，正亦不必章章字字為之守殘而射隱，如新之為親、謙之為慊；《大學》與《中庸》之為經、為緯，總之毋庸辯也。愚所知者，《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大學》言謹獨，《中庸》亦言謹獨；《大學》言忠信，《中庸》言忠恕。士皆業已一一拈出，則當涵而探之，毋使西河之民更疑于夫子。」按，文中「士皆」為王錫爵的同年蔡士皆，著有《大學解》。

³⁴ 陳生璽等譯解：《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前言》，頁4、5，謂此書的底本為萬曆

考察此書，即由〈國風〉、〈小雅〉、〈大雅〉依序進講，每首詩之前先有「總評」，詩歌則全文引述，並區分段落以利說解，因此每段落後均有「今譯」及「張居正講評」，當然這樣的編排形式是今人重編的。經由此書可以發現，張居正等輔臣與講官們並未嘗試建立自己的說解觀點，而是以朱熹《詩集傳》之說為藍本。

其中〈雅〉、〈頌〉多屬朝廷王臣的述作頌歌，適合作為帝王之學，如，刺幽王任用小人之詩〈大雅·召旻〉，「張居正講評」有謂：「吁，親賢臣遠小人，此盛周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所以衰周之傾頹也，用人得失，興亡遂判，宜詩人嘆息致恨于幽王歟？」又如，微子見祖廟之詩〈周頌·有客〉，「張居正講評」有謂：「吁，周人于微子之朝廟既喜且至，復悲其去而留之切如此，可謂親愛之無已矣。後世有天下者，反忌人之子孫至于殄災無遺，亦獨何哉。」³⁵是故，〈雅〉、〈頌〉用於帝王之學，正足以曉示國家興亡治亂之道以資借鏡。

〈雅〉、〈頌〉之外，〈國風〉亦皆編入教材，包括朱熹《詩集傳》中目為「淫詩」的篇章。這些「淫詩」如何說解？對於帝王之學有何意義？自是應該詳考。

張居正說解的方式，仍是以《詩集傳》為藍本。有悉照《詩集傳》說解的詞語者，如〈邶風·靜女〉，《詩集傳》謂：「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全詩「總評」曰：「此淫奔期會而作也。」³⁶

有精簡《詩集傳》之說者，如〈鄭風·揚之水〉，《詩集傳》：「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它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張居正「總評」：「淫者相謂。」³⁷

有總括《詩集傳》之說者，如〈鄘風·桑中〉，《詩集傳》：「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張居正「總評」曰：「淫奔者歌此。」³⁸

有敷演《詩集傳》之說者，如〈衛風·木瓜〉，《詩集傳》謂：「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張居正「總評」曰：「疑亦男女贈答之詞，

四十年刊刻的《新鐫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此本現僅存「海內孤本」，故重新出版。

³⁵ 〈大雅·召旻〉「張居正講評」，見《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以下簡稱《詩經讀本》），頁516；〈周頌·有客〉，見頁538。

³⁶ 〈靜女〉見《詩集傳》，頁438；《詩經讀本》，頁62。

³⁷ 〈揚之水〉見《詩集傳》，頁479；《詩經讀本》，頁123。

³⁸ 〈桑中〉見《詩集傳》，頁444；《詩經讀本》，頁68。

言人交際之禮，施而不報，則情中輟，報而不厚，則情不堅。」³⁹

朱熹《詩集傳》視為「淫詩」的篇章，張居正的說解大體一致。甚至朱熹三傳弟子王柏（1197-1274）在所著《詩疑》力主刪削的〈召南·野有死麇〉，⁴⁰《詩集傳》謂此詩：「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汙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張居正的「總評」亦不以「淫詩」目之，而謂：「此美貞女之自守也。若曰：情欲人所易徇，求其能以禮自防者，惟我貞女乎，何言之。」⁴¹

張居正的講章對於《詩集傳》「淫詩」之說，僅有〈鄭風·叔于田〉是部分採用、不納入有疑義之說。《詩集傳》謂此詩：「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也。」張居正「總評」即採用前段說解，判為：「國人愛段而作此」，⁴²而不將之視為男女相悅之詞。

為了順應教學，張居正的說解均較《詩集傳》簡明，然在「總評」中直言「此淫奔期會而作也」、「淫者相謂」、「淫奔者歌此」，具有什麼教育意義？考察他對諸詩的說解，可以一窺這些所謂「淫詩」作為教材的立意：

其一，以知世變。如〈王風·大車〉，全詩「總評」曰：「大夫有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詩末「張居正講評」謂：「若謂予同穴之言為不信，則有如皎日在焉，足以鑒我之衷而永不逾盟者矣，徒為一時感激之言哉。吁，觀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而不敢奔，是特苟免刑罰耳，而相奔之心未嘗忘也。其去二南之化遠矣哉，是可以觀世變矣。」⁴³

其二，以觀風俗。如〈鄘風·桑中〉詩末「張居正講評」謂：「吁，衛之淫亂至此，所謂其政敝，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要皆宣公、宣姜誨淫于上，則其俗之不美有自來矣。」⁴⁴

其三，以察人情。如〈衛風·木瓜〉詩末「張居正講評」謂：「是人之交際如此，故能相與有終也，然則男女之際，其物之厚往薄來者豈有他哉，亦欲其情好

³⁹ 〈木瓜〉見《詩集傳》，頁460；《詩經讀本》，頁94。

⁴⁰ 見〔宋〕王柏：《詩疑》（北京：學苑出版社《詩經要籍集成》第10冊，2002年），頁123。

⁴¹ 〈野有死麇〉見《詩集傳》，頁418；《詩經讀本》，頁30。

⁴² 〈叔于田〉見《詩集傳》，頁470；《詩經讀本》，頁108。

⁴³ 《詩經讀本》，頁104、105。其說本於《詩集傳》頁467-468：「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而能由人的心靈層面切入分析，說得更加入細。

⁴⁴ 《詩經讀本》，頁69。

之有來耳。」⁴⁵

其四，以資借鑒。如〈衛風·氓〉之「總評」曰：「此淫婦爲人所棄作也，言天下之事不謹于始，未有不悔于終，我也懲創往事，有不勝其□者矣。」詩之最末「張居正講評」曰：「夫既不思其反覆以至此，則以往之失已不可追，而今日之悔將无所及，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吁，淫婦失身于始，而獨不慮及于終，及夫見棄于終而後追悔于始，不亦晚乎？是足以爲淫奔者之永鑒矣。」⁴⁶

以上四端，多就詩意引伸評述，然也有純就詩句講解、不另引伸者，如〈王風·采葛〉，全詩「總評」謂：「淫奔者歌此。」詩末「張居正講評」謂：「斯人也，我所欲常常見之而日相親者也，故一日不見，則思念之切猶如三月之久矣。夫以一日之近而視之以三月之久，則我之于爾，豈忍一日相違也乎？」⁴⁷

既然是「淫詩」，爲何被選入《詩經》？又具有何種教化意義？朱熹在〈詩序辨說·鄘風·桑中〉已作說明：

夫子之於鄭、衛，蓋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⁴⁸

張居正顯然贊同朱熹的觀點，所以他的《詩經》講章，除解詩本於《詩集傳》，其視「此淫奔期會而作也」、「淫者相謂」之詩，也認爲足以知世變、觀風俗、察人情、資借鑒，因此沒有刪廢的問題。⁴⁹

張居正等編《詩經》講章，所以依循朱熹《詩集傳》，最主要是明成祖時編纂《五經、四書大全》，其中《詩傳大全》即以朱熹《詩集傳》爲底本，書成頒行天下，⁵⁰作爲士子課讀《詩經》、投考科舉的範本，明代皇族的《詩經》講習，亦皆以其說爲依據。

⁴⁵ 《詩經讀本》，頁 94。

⁴⁶ 《詩經讀本》，頁 84、89。

⁴⁷ 《詩經讀本》，頁 104。

⁴⁸ 《朱子全書·詩序辨說》，頁 365。

⁴⁹ 後人亦有相類的看法，如〔清〕沈德潛：《說詩晬語》（臺北：藝文印書館《清詩話》本，1977年），卷下，頁 683，亦謂：「《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豔情發也。」

⁵⁰ 關於《五經大全》之纂編，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98年）已有論述，可參。

張居正等撰的《詩經》講章之外，張廷玉《明史》另著錄易貴的《詩經直指》十五卷。⁵¹易貴，字天爵，宣慰司籍吉水人，幼聰穎出群，長大後有「通朗剛正，淹貫載籍」之譽，景泰五年（1454）登進士，高中廷試二甲第二名，歷官辰州府知府。⁵²所著《詩經直指》，今已亡佚，但據易貴登第時間，此書可能是明景帝朱祁鈺（1428-1457），或是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復辟之後教習所用，屬於明代較早期的《詩經》講章。

明代宗藩的《詩經》講讀，亦本於朱熹《詩集傳》，並有好學宗藩卓然有成，對《詩經》特別精研，能有所著述。如周藩鎮國中尉朱睦㮮（1517-1586），「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著《五經稽疑》中，有《毛詩稽疑》專著。⁵³又如，寧藩鎮國中尉朱謀㙔（1549-?），幼由其父奉國將軍朱多煊（?-1585）「自督課，授《五經》《史》《漢》，旁及星曆」，長則精於《詩經》，著有《詩故》。⁵⁴

朱睦㮮《五經稽疑》，初題名「六經稽疑」，其〈五經稽疑序〉謂：「余少靡所好，遊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爲也。」後因病閉門謝客，而取四經時加披閱，「或有疑者，參定諸家之說而折衷之」，⁵⁵故此書有折衷諸家的意圖。朱謀㙔《詩故》亦要「通乎毛、韓、齊、魯之周」，破除四家詩說的偏蔽，闡明詩篇的意旨。⁵⁶二位宗藩論《詩》不隨同流俗，亦不偏執一說，其立意與作法均難能可貴。

⁵¹ 見《明史》，卷96，〈志第七十二·藝文一·經類·詩類〉，頁635。

⁵² 見〔明〕過庭訓等編：〈易貴〉，《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40冊，1991年），卷15，頁738。

⁵³ 《明史》，卷116，〈列傳第四·諸王一·鎮國中尉睦㮮〉，頁948。所著《五經稽疑·毛詩稽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4冊，1983年出版。

⁵⁴ 見〔明〕焦竑：〈輔國將軍拱概〉，《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影印本，第109冊，1991年），卷1，頁52。

⁵⁵ 見《五經稽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4冊，1983年），卷前，頁680。

⁵⁶ 《詩故》的撰著及內容，林慶彰：〈詩故提要〉，《詩故》（北京：學苑出版社《詩經要籍集成》，第14冊，2002年），卷前，頁1，有所說明，可參。

五、明神宗《詩經》講習與詩歌創作的關係

明代皇族的《詩經》講習，除了就經文說解，用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材之外，因為《詩經》同時是各體詩歌的源頭及典範，所以附帶具有創作上的意義。

明代皇帝因有寫作朝廷廟堂頌歌的任務，故多四言詩之作。以朱彝尊《明詩綜》所纂錄的二十三首明代皇帝詩作觀察，明神宗的詩作共收二首，分別為〈畫眉山龍王廟碑詩〉及〈灤縣景命殿詩〉，二詩均為四言詩，該書還收錄明成祖朱棣（1360-1424）〈勃泥長寧鎮國山詩〉、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思賢詩〉、明憲宗朱見深（1447-1487）〈闕里孔子廟詩〉、明孝宗朱祐樞（1470-1505）〈闕里孔子廟詩〉，亦均為四言詩。⁵⁷這些四言詩與《詩經》是什麼關係？

首先，皇帝寫作四言詩，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繼承，因為在詩歌寫作的傳統中，四言詩是朝廷廟堂述作頌歌的重要形式，李東陽（1447-1516）在〈書讀卷承恩詩後〉對科舉不以詩賦取士提出建言時，即曾強調詩賦記錄誦揚朝廷典章制度的功能，謂「〈九敘〉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詠成功者，皆是物也。」⁵⁸所以皇帝有御製四言詩的任務與需求，《詩經》也成為學習對象和摹寫範本。⁵⁹

其次，皇帝除了在《詩經》形式與寫作意義上的追摹，也有詩句與詩意的引用，如明神宗的〈畫眉山龍王廟碑詩〉：

於赫龍王，不顯其光。上下帝旁，噓翕無方。為雷為霆，為雲為雨。有開必先，靡求不與。我求伊何，黍稷稻粱。爾與伊何，千倉萬箱。眉山之下，

⁵⁷ 以上〈畫眉山龍王廟碑詩〉及〈灤縣景命殿詩〉，見〔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1970年），卷1上，頁12、13；〈勃泥長寧鎮國山詩〉見頁3；〈思賢詩〉見頁4；明憲宗〈闕里孔子廟詩〉見頁9；明孝宗〈闕里孔子廟詩〉見頁10。又如〔清〕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亦收錄明神宗的〈灤縣景命殿詩〉（〈甲籤〉，卷1上，頁19），其他分別為明成祖〈闕里孔子廟詩〉、〈浚泥長寧鎮國山詩〉、〈柯枝鎮國山詩〉（頁7、8）；明宣宗〈招隱詩〉（頁12）；明憲宗〈闕里孔子廟詩〉（頁16）；明孝宗〈闕里孔子廟詩〉（頁16）；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欽天頌〉（頁18）。

⁵⁸ 見〔明〕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卷13，頁193、194。

⁵⁹ 明代四言詩的摹寫範本，不一定全為《詩經》，也有以漢魏古詩為摹擬對象，如〔明〕李攀龍：《白雪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隆慶四年汪時元刻本，2002年），卷12，〈四言〉，頁562，有四言詩〈效阮公二首〉。

龍王之宇，迄用康年，穀我士女。⁶⁰

詩中「黍稷稻粱」、「千倉萬箱」、「穀我士女」俱出自《小雅·甫田》；「迄用康年」出自《周頌·臣工》；「不顯其光」則用《周頌·維天之命》「於乎不顯」之意。其〈灤縣景命殿詩〉詩中，「周原膺膺」亦出自《大雅·緜》；「鳥革翬飛」出自《小雅·斯干》，顯見明神宗的《詩經》講習，對於詩歌創作有深刻影響。⁶¹

明神宗的四言詩作也顯示，皇帝對《詩經》的摹寫，多集中在〈雅〉、〈頌〉。此與一般士人不盡相同，士人沒有帝王身分、朝廷述作的需求，所以多見摹寫〈國風〉，用以言志抒情或憂時諷諫，如明代詩文大家王世貞（1526-1590）的次子王士驥，即有多首摹擬《詩經》之作，如〈陟陂〉三章，下署「畏讒也」；〈六月〉三章，係「自傷也」；〈清露〉四章，自署「勞者之歌」；〈桃之華〉三章，係「有刺也」。⁶²

此外，前述諸詩雖為「御製」，但也可能有文臣代筆或是誤傳的問題。朱彝尊《明詩綜·靜志居詩話》在明神宗〈灤縣景命殿詩〉後即謂：

內府向藏御製詩文一卷，今已無存。《列朝詩集》所載〈勸學詩〉一章，未必出於御製也。謹錄〈龍王廟〉、〈景命殿〉二碑銘詩。⁶³

顯然朱彝尊考慮到詩作真偽的問題，所以選擇著錄碑刻上的銘詩。不過〈勸學詩〉是否出自明神宗御筆，實已難以考辨。皇帝能御製詩歌，雖屬語文能力的訓練及文化傳統的傳承，不過，以帝王學的觀點，並不是講習重點。張居正在萬曆二年（1574）訓勉明神宗勿沉溺於書法技藝時，謂：

⁶⁰ 見《明詩綜》，卷1上，頁12。

⁶¹ 明宣宗〈招隱詩〉（見《明詩紀事》，〈甲籤〉，卷1上，頁12）亦有「〈卷阿〉之思，梧桐鳳凰」之句。〈卷阿〉為〈大雅〉中的篇章，為召康王從成王游於卷阿所作，「梧桐鳳凰」即詩中「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意即鳳凰鳴於高崗，將擇梧桐以棲；梧桐生於東方朝陽照耀之處，將為鳳凰所棲。所以明宣宗引用此詩，以示治世之賢才思效用於君，治世之賢君將委用賢才，就好像鳳凰與梧桐的相需而相遇。

⁶² 見〔明〕王士驥：《中弇山人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集部第32冊，2000年），卷1，頁537-539。

⁶³ 見《明詩綜》，卷1上，頁13。

竊以為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以來，至於唐宋所稱英賢之主，皆以其脩德行政，治世安民，不其聞其有技藝之巧也。惟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六朝梁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寧宗，皆能文章善畫，然皆無救於亂亡，可見君德之大，不在技藝之間也。⁶⁴

儘管如此，在張居正眼中，詩歌寫作對於帝王學仍有意義。如他在萬曆九年（1581）正月十四日所上的疏文所說：「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⁶⁵但因為有文臣可以隨侍代筆，皇帝就不必花費過多的時間精力來學詩，此亦自古以來的傳統，所以他在疏文中說：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雋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瞻，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在館祇候。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聖覽。⁶⁶

「代筆」的制度，使得皇帝的學詩寫詩，變成沒有迫切性，所以明神宗的《詩經》講習重點並不在寫作的摹習。

至如明代宗藩，因為無政治實權，又深被朝廷所防備，所以多從事文藝，尤喜致力於詩歌創作，此即李維楨（1547-1626）在〈朱宗良詩序〉所謂：「余惟國家以宗正條束濕諸宗人，四民之業，一無得與，則趨驚於立言，而所謂立言，不在文而在詩。」⁶⁷

⁶⁴ 《萬曆起居注》，第1冊，（萬曆二年閏十二月十七日丁亥），頁251-252。

⁶⁵ 《萬曆起居注》第2冊，（萬曆九年正月十四日乙卯），頁115-118。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明〕李維楨：〈朱宗良詩序〉，《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明萬曆三十五年刊本，集部第152冊，1997年），卷19，頁713。按，朱宗良即寧藩輔國中尉朱多燝（1530-1607）。

宗藩喜以寫詩立言，但實際以四言詩著稱者並不多，如《明詩綜》收錄蜀獻王朱椿（?-1423）有〈送方希直先生還漢中〉；鄭世子朱載堉有〈南陔〉三首、〈白華〉五首、〈華黍〉五首等，俱為四言詩；⁶⁸《明詩紀事》則收錄楚憲王朱季琨（?-1443）有〈昭王碑詩〉、〈莊王碑詩〉。⁶⁹在該書所錄詩作中屬少數，其中朱載堉精於音律，其四言詩或能絃歌，楚憲王之作則是碑文銘詩。

宗藩雖能詩者眾，但四言詩並非他們寫作的興趣和學習標的，因此《詩經》對宗藩詩歌創作的影響並不是非常顯著。不過，遼藩奉國將軍朱術埕（1551-1598）的學習經驗，仍值得觀察。朱術埕五歲學習屬對，即有「金眸玉爪不凡材」之句，長成後，學詩於趙郡宋山人，宋山人檢驗他的詩作，並曉示學詩之法：

宋謂，君得詩法，未知詩味也。因舉杜少陵詩註中語示之，君益喜，妙析奇致。山人旁通《五經》，君復為受經，自《三百篇》以降，至國朝諸名家詩，揚摧上下，往返精苦，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夜入帳眠，至曉迴轉，不得快熟。思懷所通，奚翅儒域矣。⁷⁰

「趙郡宋山人」即宋登春，曾長期客居遼藩，⁷¹朱術埕深受其影響，並在其指導下研讀《五經》，又苦心上溯《詩經》，得到創作的啟發。由宋登春對朱術埕的引領，可以窺知《詩經》對於詩歌創作的意義，不在於字句形式上的摹寫，而是在於「詩味」，切重於情性思想上的提昇會通，也是境界的追求。

六、結 論

明代皇族教育是個複雜的議題，皇族對《詩經》的講讀接受，也不只限於《詩經》本文的講習及創作的摹寫，而應是多元的，包括養性淑身、應用治世等，本論文的討論實難以齊備，篇幅所限，以下僅以數點作結：

其一，《詩經》為明代皇帝經筵、日講的重要內容，以明神宗的講習過程來看，多接續在《四書》及《尚書》之後進講，也有列在《禮記》之後講習，顯示

⁶⁸ 〈送方希直先生還漢中〉見《明詩綜》，卷1下，頁2；朱載堉詩見卷1下，頁15-17。

⁶⁹ 《明詩紀事》，〈甲籤〉，卷2上，頁46。

⁷⁰ 〔明〕李維楨：〈遼府奉國將軍桂亭公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卷77，頁319-320。

⁷¹ 宋登春，字應元，號海翁、鵝池生。〔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丁集中，頁514-515，有徐學謨〈鵝池生傳〉。

《詩經》在《五經》之中，並非帝王學的入門學科。同時，不同的輔臣因自身學術背景的差異，對於《詩經》在帝王學中的意義，可能有各異的觀點，因而在所編撰的《詩經》講章中，體現了講論的不同趨向。

其二，觀察張居正等輔臣為明神宗所編的《詩經》講章，其內容以朱熹《詩集傳》為藍本，朱熹視為「淫詩」的篇章，均編入教材。由講章的內容可以進一步歸納，這些所謂的「淫詩」，具有知世變、觀風俗、察人情、資借鑒的教育意義，與張居正在上疏時力主《詩經》的講習目的：「本人情，該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於君德治道，裨益不淺」，堪稱符合，因此沒有刪廢的問題。

其三，由明神宗所接受不同階段的《詩經》講習狀況，可以察見帝王教育所面臨的最大考驗，在於「受教者」是否樂於學。其關鍵為帝位崇高、皇權高漲，皇帝可以決定講習的內容、方式，亦可質疑或評鑑講官，決定他們的去留。明神宗年齡增長，自主性增強，學業卻是日易曠廢，經筵、日講俱形同虛設，輔臣及講官們在講習的過程中節節敗退，教學風格也趨於屈奉順從，教學成效自是難以彰顯。

其四，明代宗藩《五經》俱習，但朝廷並不在意教學成效，也未刻意鼓勵。其《詩經》的講讀內容亦本於朱熹《詩集傳》，並有好學宗藩能有所著述，甚至不隨同流俗，能折衷舊說，提出己見。

其五，由於《詩經》是各體詩歌的源頭及典範，所以在帝王教育中具有創作上的意義，明神宗所寫〈畫眉山龍王廟碑詩〉及〈灤縣景命殿詩〉，除襲用四言詩的形式，具有繼承及發揚文化傳統的意義，也直接引用《詩經》的詩句與詩意，可見出《詩經》講習的多方面影響。不過因為「帝王之學當務其大」的觀念，及詞臣代筆的制度，所以摹寫《詩經》並非《詩經》講習的重點。至如明代宗藩熱衷寫詩，有直接擬寫《詩經》，也有視之為情性思想的提昇標的，但均十分少數，宗藩的《詩經》講讀成效，仍以經義的說解，如周藩鎮國中尉朱睦㮮《毛詩稽疑》、寧藩鎮國中尉朱謀㙔《詩故》，較為出色。

徵引文獻

(一)古籍

〔宋〕王柏：《詩疑》，北京：學苑出版社《詩經要籍集成》第10冊，2002。

- *〔宋〕朱熹著，朱傑人校點：《朱子全書·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校點：《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不著撰人：《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明末抄本及民國抄本，1988。
- *〔明〕不著撰人：《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5。
-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全集》，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王時敏刻本，1997。
- 〔明〕朱睦㮮：《五經稽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4冊，1983。
- 〔明〕朱謀㙔：《詩故》，北京：學苑出版社《詩經要籍集成》第14冊，2002。
- *〔明〕朱謀㙔：《藩獻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1994。
- *〔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五年刊本，1997。
-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1966。
- *〔明〕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2002。
-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40冊，1991。
-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
-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 〔清〕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
- *陳生璽等譯解：《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二）近人論著

- 尹選波：〈培養聖德，開導聖學——張居正對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早期教育論述〉，《廣東社會科學》4，2007：118-125。
- 朱子彥：〈明萬曆朝經筵制度述論〉，《社會科學戰線》2，2007：122-128。
- 朱鴻林：〈明神宗經筵進講書考〉，《華學》第9、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8：1367-1378。

杜建國：《明代皇族教育問題研究》，吉林：吉林大學文學院史學碩士論文，2006.10。

林慶彰：〈中國經學發展的幾種規律〉，《經學研究集刊》7，2009.11：107-116。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深圳：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98。

連文萍：〈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12，2009.12：231-260。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97。

劉毓慶：〈陽明心學與明代《詩經》研究〉，《齊魯學刊》5，2000：52-57。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shengxi. *Zhang juzheng jiang ping shi jing huang jia dou ben (Zhang Juzheng critiques the poetry imperial family textbook)*. Shanghai :Academia Press,2009.

Li, dongyang. *Da ming hui dian (The Ming Dynasty meets the standard)*. Yangzhou : Guangling literary society,2007.

Ming shi lu (Bright factual record). Taipei:Academia Sinica history language institute,1965.

Wang, xijue. *Wang wensu gong quan ji (Wang wensu male complete works)*. Tainan:Dignified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1997.

Wanli qi ju zhu (Wanli record of the emperor's daily activities). 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1988.

Zhang, juzheng. *Zhang tai yue xian sheng wen ji (Opens Taiyue gentleman the antholog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2002.

Zhang, tingyu. *Ming shi (Ming Dynasty history)*. Taipei:Ting Wen Co.,Ltd. 1979.

Zhu, mouhan. *Fan xian ji (The fence offers records)*.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1994.

Zhu, xi. *Zhuzi quan shu (Zhuzi entire book)*. 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2002.

Zhu, yizun. *Ming Shizong.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records)*. Taipei: World publishing house,1970.

The Ming Emperor Wanli and His Royal Gathering Study of the *Book of Odes*

Lian, Wen-ping

(Received December 31, 2010 ; Accepted April 27, 2011)

Abstract

The *Book of Odes* is one of 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as well as the source of various styles of poetry. This significant work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tudies of both the classics and of literatu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ing Emperor Wanli (Zhu Yijun, 1563-1620) and His Royal Gathering Study of the *Book of Odes*, along with that studying experiences among other imperial kinsmen, connecting with the document textual criticism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ok of Odes* in the emperor's educ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tudying purposes as well as the studying ways of the *Book of Odes*, and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mong the assisted ministers about the book, and how those of the royal family holding feudal benefices studied the book and the results of their effor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of Odes* in poetic creations of the Ming royal family. This study looks onto some dimensions in the imperial kinsmen's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also looks into its influence in poetic creations of the Ming imperial family.

Keywords: Book of Odes, poetry, the Ming Emperor Wanli, imperial kinsmen, education, Ming dynasty